

云南民族『直过区』
居民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

杨栋会◎著



科学出版社

云南民族“直过区”居民收入 差距和贫困研究

杨栋会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扶贫开发和平衡收入差距是科学发展的重要体现。我国民族众多、环境多样、各民族发展起点不同,因此分类研究不同类型的民族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是非常必要的。本书以云南“直过区”少数民族收入差距和贫困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其收入不平等显著,贫困严峻,农业仍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和公共服务匮乏分别是其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最主要因素。

本书可供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民族“直过区”居民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 / 杨栋会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3-033638-5

I. 云… II. 杨… III. ①民族聚居区—居民收入—城乡差别—研究—云南省②贫困问题—研究—云南省 IV①F126.2②F12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9972 号

责任编辑: 林 剑 / 责任校对: 刘小梅

责任印制: 钱玉芬 / 封面设计: 耕者工作室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立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1/2

字数: 305 000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10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16
第四节 数据来源	19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9
本章小结	19
第一章 理论和方法	21
第一节 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回顾	21
第二节 贫困理论	30
第三节 贫困和不平等的关系	38
第四节 评述	40
第五节 本书的理论和方法	41
本章小结	43
第二章 云南民族“直过区”	44
第一节 云南民族“直过区”及其政策	44
第二节 新时期云南民族“直过区”扶贫开发	47
第三节 布朗山扶贫开发	50
第四节 “直过区”发展滞后原因	59

本章小结	65
第三章 布朗山及研究样本选择	66
第一节 布朗山概况	66
第二节 布朗山三大少数民族	70
第三节 样本选择	74
本章小结	83
第四章 样本设计和指标选取	84
第一节 调查设计	84
第二节 调查的内容	90
第三节 指标选取及含义	92
第四节 变量统计描述	99
本章小结	103
第五章 布朗山乡不平等和贫困状况	105
第一节 乡级不平等和贫困状况	105
第二节 行政村不平等和贫困状况	110
第三节 自然村不平等和贫困状况	114
第四节 各少数民族不平等和贫困状况	119
本章小结	123
第六章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相关因素分析	124
第一节 家庭特征与各民族的贫困与不平等	124
第二节 人力资本与农户的贫困和不平等	125
第三节 宗教信仰与各民族贫困和不平等	130
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各民族的贫困和不平等	134
第五节 物质资本与固定资产投资	135

第六节 土地和种植结构·····	138
第七节 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143
本章小结·····	147
第七章 农户贫困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149
第一节 研究方法·····	149
第二节 变量与研究假说·····	152
本章小结·····	159
第八章 收入不平等的分解·····	160
第一节 研究方法·····	160
第二节 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分解结果·····	163
本章小结·····	177
第九章 结论、借鉴及政策建议·····	179
第一节 发现和结论·····	179
第二节 经验借鉴·····	184
第三节 政策建议·····	191
第四节 本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197
本章小结·····	199
参考文献·····	200
附录·····	205

引 言

扶贫开发 and 平衡收入差距是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举措。因此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农村扶贫开发和平衡收入水平，并采取了世所公认的创新措施。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对贫困标准理解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减贫和平衡收入差距将是长期的任务。因此，本章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数据来源，并说明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和贫困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正义问题，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贫困经济学理论指出，贫困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绝对贫困是生存贫困，而相对贫困实质上就是收入不平等的显示。收入不平等状态越严重，社会财富就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将会导致相对贫困的增加，而相对贫困的增加和恶化，必然会导致绝对贫困的上升。

贫困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由于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参与基本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贫困发生的理论解释有多种，如要素稀缺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分配论、人口贫困论、市场力量论、人力资本缺乏论等。不管理论家如何解释贫困的发生，消除或减弱贫困总是政府的重要责任。政府运用一定的公共财政政策 and 公信力，提供贫困地区 and 贫困人口所需要

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并组织社会力量，解决因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风险与不确定性、社会分配不公等而产生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GDP 每年增长速度达 9% ~ 10%，有些年份甚至高于 10%，大大快于其他国家（World Bank, 2001）。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减少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和消除民族发展不平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农村扶贫一直是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从广义上说，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可以上溯到 1978 年。改革农村经营制度并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发展乡镇企业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也打开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出路。从 1978 年到 198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2.6 倍，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了 14%，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 2.5 亿人减少到 1.25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到 1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甚至是绝对贫困问题显得越发突出和重要，为此，我国于 1986 年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 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标志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第二阶段即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 年）。到 1993 年年底，农村贫困人口由 1.25 亿人减少到 8000 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从 14.8% 下降到 8.7%。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贫困人口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性特征，集中分布在西南大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秦巴贫困山区以及青藏高寒区等几类地区。这些地区的贫困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社会发育程度、民族、境外因素、毒品和艾滋病、连片贫困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扶贫开发难度很大。为此，1994 年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并组织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我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攻坚阶段。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经过多方努力，到 2000 年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我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解决了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各项社会事

业发展较快,解决了一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随着“八七计划”的如期实现,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和扶贫开发工作有了新任务,因此2001年5月及时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标志着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为贫困地区实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的新阶段(2001~2010年)。随着《纲要》的实施,上述目标基本实现。以云南省为例,在此期间贫困人口数量明显减少,全省贫困人口从2000年年底的1022.1万人下降到2009年年底的540万人,减少了482.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9.63%下降到14.8%;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云南省7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GDP从2000年的2207元提高到2009年的7198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从120元提高到41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1100元提高到2009年的2569元,其中2009年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特殊困难群体和区域脱贫基础得到夯实,全省特困人口从2000年的337.5万人下降到2009年年底的151.5万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加强,新增和改建农村公路里程44.73万公里,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1248万亩^①,旱涝保收面积增加到675万亩,全省农村水电新增装机755万千瓦,解决和改善了496.16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行政村通公路率、通电率、通电话率、通广播电视率,分别达到63.4%、98.3%、99.1%和95%;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发展加快。云南省在73个重点县完成学校修缮投资65.98亿元,建设学校10278所,项目建设面积达892.36万平方米;建设卫生院793个,新农合参合率达90%以上;2009年全省低保对象达到338万人,月人均救助水平达60元;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条件不断改善。结合“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共建设沼气池83.22万口,推广节能灶44.14万口,80个重点县生态林建设2385.5万亩^②。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采取了世所公认的创新措施,即坚持开发式扶贫模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

① 1亩≈666.7平方米。

② 以上数据均来自于云南省扶贫办公室。

力,走开发式扶贫的道路,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制定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确定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①,适时调整扶贫重点、制定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发展的优惠政策、扶持到户、科技教育扶贫、社会帮扶、定点扶贫、东西部协作扶贫、移民搬迁和异地开发、国际交流与合作^②等,并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农村扶贫开发组织实施模式,即以中央、省、地(市)、县、乡、村委会和农户垂直扶持为主,以金融、国企、私营部门和社会横向帮扶为辅的扶贫开发模式。

与此同时,我国妇女和残疾人等特殊贫困群体的扶贫开发工作也在进行。为帮助妇女扶贫,实施了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专门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援助西部缺水地区妇女的“母亲水窖工程”等专项扶持项目。1998年国家专门制定《残疾人扶贫攻坚计划(1998—2000年)》,确定残疾人扶贫的目标、任务、途径、措施、政策,对残疾人扶贫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经过努力,中国贫困残疾人口数量明显减少,近10年有1000万人解决了温饱,到2000年年底贫困残疾人口下降到979万人。

与此同时,我国的贫困线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从1986年的206元,调整到1988年的260元、1990年的500元、1999年的625元的极端贫困标准和低于865元的相对贫困标准、2008年的786元绝对贫困线和1067元的相对贫困线,2009年我国农村贫困线为1196元。

另外,我国也特别重视特殊贫困群体和区域的扶贫开发事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国务院扶贫办在2010年专门成立了革命老区扶贫发展办公室。“八七计划”期间,全国348个少数民族地区县和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县中有257个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从1994年到2000年,国家共向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人

^① 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数量较多的省份是:云南(73个)、陕西(50个)、贵州(48个)、四川(43个)、甘肃(41个),数量较少的省(自治区)是:广东(3个)、浙江(3个)、吉林(5个)、海南(5个)、西藏(5个)。从集中连片的角度看,这些贫困县主要分布在18个贫困地区。

^② 世界银行扶贫贷款先后援助进行中国西南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国秦巴山区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和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口较多的省投入扶贫资金 432.53 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 38.4%，设立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少数民族扶贫专项贷款”、“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兴边富民”等专项资金或专项扶贫规划。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0—2010 年）》中，民族自治地方确定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67 个（不含西藏）^①，比“八七计划”增加 10 个县，占全国同期扶贫重点县总数的 45.1%。在实施贫困瞄准战略中，民族自治地方共有 48 079 个村列为贫困村，其中 18 370 个村被列为首批实施扶贫开发规划的贫困村，分别占全国贫困村和首批实施扶贫开发规划贫困村总数的 32.5% 和 33.1%。这些措施使得广大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收入明显增加，生产生活措施得到明显改善。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帮助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牵头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旨在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了情况，向国务院提出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重视，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列入国家议事日程。国家“十五”规划把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任务。2000 年，国家民委会同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在云南基诺族、布朗族聚居的基诺山、布朗山，开展了以集中投入专项资金为特征，以稳定解决温饱、尽快改善“两山”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脱贫致富为目标的“两山”综合扶贫开发规划。经过几年的集中扶持，贫穷落后的“两山”旧面貌已成历史，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教育、卫生、文化等项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为基诺族、布朗族脱贫奔小康奠定了基础。2001 年，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函〔2001〕4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复函》，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作出明确要求，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人口较少民族实行特殊扶持政策，改善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条件等，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同时，为了增加扶持力度和扩大扶持面，特在国家第二个

^① 西藏作为特殊片区，74 个县（市、区）整体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措施中将人口较少民族扶持范围从人口不足 10 万人扩大到总人口在 30 万人以下，仅云南省受扶持的人口较少民族就从 7 个即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和布朗族而增加为包括景颇族在内的 8 个，受扶持的村委会和自然村从“一五”期间的 175 个村委会、1407 个自然村扩大到“二五”期间的 395 个村委会、3520 个自然村，扶持人口从约 17 人增加到 38 余人（云南省扶贫办，2010）。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对贫困标准理解的不断深入，上述减少和削弱贫困趋势在部分民族地区出现了减弱、停滞甚至倒退。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地分布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91.2% 以上分布在贫困地区，约 24.7% 的少数民族村庄是贫困村，相比之下，汉族村庄这一比例是 11.03%，前者是后者的 2 倍多。2010 年民族自治地方绝对贫困及低收入人口占全国同口径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1451.47 万人的比重为 50.15%，比上年 47.18% 上升了 2.97 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比全国的 1.24% 高 5.06 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占全国低收入人口 2911.8 万人的比重为 53.16%，比上年上升了 8.19 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 41.10% 高 10.32 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与低收入人口合计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为 54.61%，比上年上升了 8.17 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高 16.11 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592 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贫困监测显示，2010 年在被调查的 1891 个少数民族聚居村中，绝对贫困人口占全部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由上年的 46.71% 上升到 48.22%，低收入人口所占比例由上年的 43.18% 上升到 48.09%。据不完全统计，民族自治地方当年因灾因病返贫人口为 213.83 万人，比上年增加 64.11 万人；返贫率为 21.91%，比上年高 8.61 个百分点。民族自治地方还有 5103.92 万人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比上年减少 231.21 万人，除贵州和西藏外，全国缺乏基本生存条件需异地搬迁对象有 106.63 万户，共 387.23 万人。

贫困尤其是民族贫困导致地区发展滞后，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119 个自治县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基尼（Gini）系数由 2000 年的

0.3281 增至 2010 年的 0.3614。2009 年 GDP 居前 10 位的民族自治县 GDP 平均值为 106.88 亿元（当年价计算），后 10 位的平均值为 11.38 亿元，前者的农户人均收入是 3019 元，后者的农户人均收入是 1823 元，相差 0.66 倍。

社会学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诱因，因此有人提出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从经济学上说，收入差距过大通常被认为是负的公共物品，因为收入差距越大，人们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幸福感越低。Knight 和 Gunatilaka（2006）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不满意程度来自于与左邻右舍的比较。人首先是社会人，别人对自己的感受和自己对别人的感受都会对自己的幸福感产生影响，比较优势越明显，产生的优越感就越高，幸福感也就越高。因此，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内，如果大家都很贫困，人们对自身的贫穷并不敏感，但如果邻里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则不满和失落会随之增加。大量绝对贫困人口以及不断增加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会诱发社会的不稳定。近年来，农村地区有关山林、水利、土地、矿产、草场、买卖等的纠纷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艾滋病和吸毒行为蔓延之势，包括偷盗、赌博、卖淫等非法谋生现象也日趋严重（张天华，2007）。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将会造成特有的负面影响，必然影响民族团结，侵蚀国家形象，甚至冲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边疆稳定。为此，我国于 2007 年建立了民族突发事件自治县直报制度。

扶持政策是削弱和减缓发展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政策。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促进特殊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就采用了特殊的“直过区”政策。目前，我国贫困少数民族聚集区与边境贫困地区相互交织形成的带状分布特点明显，以西南少数民族“直过区”、云南怒江地区、四川西部三州（甘孜、凉山和阿坝）、新疆南疆三地州（克州、喀什和和田）、宁夏西海固地区、青海德绒藏区和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石漠化地区等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依然是我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解决难度最大的地区。这些边境民族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集中了我国大多数剩余绝对贫困人口。由于受不同的历史条件、地域分布、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特点和民族差

异、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还将继续存在。因此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贫困既有收入概念，也有比较概念。前者就是绝对贫困，后者是相对贫困概念。同时，贫困概念本身也是发展的，“隐蔽贫困”概念的提出是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既有“隐蔽贫困”意义，也为研究“隐蔽贫困”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地，因此本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理论背景

收入分配的结果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分配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两个方面，因为财产是收入的存量。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收入分配不可能在任何时点和任何状态下都是相同的，收入不平等是绝对的、平等是相对的，但追求收入相对平等是社会永恒的正义。因此，收入分配始终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个永恒的研究领域（万广华和高鸿鹰，2004）。收入分配之所以如此重要，第一，这一议题从伦理上强调公平。公平不能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衡量，归根结底还有一个从伦理的角度来衡量这个差距大小的问题（万广华和徐凯凯，2004）。第二，收入分配重要性涉及社会政治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引发犯罪，是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诱因，危害社会的稳定。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因为收入分配会影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形成，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四，收入分配和贫困之间存在相关性，收入分配不均等、财富过分集中是造成一部分人生活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发达国家，研究贫困问题最常用的视角就是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叶普万，2003）。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面积611.7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3.72%。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的贫困一直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区域的48 079个村列为贫困村，其中18 370个村被列为首批实施扶贫开发规划的贫困村，分别占全国

贫困村和首批实施扶贫开发规划贫困村总数的 32.5% 和 33.1%。西藏自治区确定贫困乡有 712 个, 其中 393 个被列为首批扶持的贫困乡。因此, 2006 年 8 月“反贫困与国际区域合作”高层国际研讨会^①就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和贫困地区艾滋病疫情、毒品问题研究作为两个讨论议题。

尽管国内外研究我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献很多, 但对少数民族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较早的有对中国少数民族状况的一般描述, 没有涉及不平等和贫困方面的专门研究。Hannum 和 Yu (1998) 讨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 研究牧区少数民族的收入状况。李实和古斯塔夫森 (2002) 分析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化。成艾华和雷振扬 (2007) 采用聚类分析法研究了民族自治县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程芳和沈再新 (2008) 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探讨了土家族和汉族的收入差距。至于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不平等和贫困状况的文献, 主要有张天华 (2007) 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成因, 赵长林和李兴绪 (2005) 仅从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指标的分解上分析了云南省 17 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收入差距, 李时兴和邹炜 (2007) 立足于 2005 年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云南独有与非独有少数民族农户收入不平等及成因。

这些研究为本书提供了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等方面有益的借鉴, 但或者因为数据样本的因素, 或者因为模型指标的因素, 这些研究对样本区缺乏代表性, 而这些正是本论文所要解决的。尽管国内外有大量关于中国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但或者因为使用的是国家、省级、县级统计资料, 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并且一个村平均调查户数不超过 30 户 (邢鹂等, 2008), 或者因为缺乏民族地区的针对性, 所以无法提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的民族贫困地区贫困和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真实情况。同时, 这种抽样信息与扶贫瞄准机制所需要的准确住户信息

^① 本次会议于 2006 年 月 22 ~ 23 日在成都召开。研讨会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大学和中国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 (CWDS) 共同主办,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世界银行 (World Bank)、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 (IFPRI)、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CES) 联合协办, 四川大学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具体承办。

不符。由于准确住户信息是提高政策效率的重要依据，要提高对村和农户扶贫瞄准效率，需要清晰地界定贫困村和贫困家庭，了解贫困村和家庭的特征及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而获得村和家庭层面的详细信息；既要有经济信息，还要有社会信息；既要有存量信息，也要有需求和选择偏好信息。

鉴于以上理由，使用住户数据，从农村内部研究贫困人口集中的边疆少数民族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对国家制定和完善消除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及和全国的发展差距、使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政策，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以及“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扶贫瞄准机制的实施，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了解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村级层面和住户层面的准确信息，掌握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和农户贫困的特征及其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本书以云南民族“直过区”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为研究对象，细致描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民族农村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状况，分析“直过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农户的收入/支出的构成，实证研究少数民族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进而寻找产生云南民族“直过区”少数民族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的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强调：“21 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关键时期。必须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努力把民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抓住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直过区”是全国最贫困、最落后、最特殊的民族地区之一，没有“直过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因此，必须加大帮扶力度，使其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其他民族一起步入小康社会。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民族区域和民族间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民族区域和民族间和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和正义（刘尚希，2007）。在现阶段，缩小居民福祉水平差距、保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持社会和谐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国家民委，2009）。

云南“直过区”民族包含了云南15个特有民族中的14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直过区”大多处在边境线上，很多民族跨境而居，自古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交往的通道；“直过区”自然资源丰富，自然环境好，大多数地区尚未开发，因此促进云南民族“直过区”跨越式发展有利于实现云南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三大战略目标，为发展具有云南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直过区”集中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边疆地区发展中最典型的问题，解决了“直过区”的问题，能为解决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边疆地区和社会经济发展最贫困和最不平衡的问题提供经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三）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直过区”是以山地锄耕农业为基础的地区，与内地相比，生产力水平大大落后于其他地区，区域经济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生产方式落后。在同一环境下，由于民族的特殊性，他们的发展水平也落后于其他民族，同时，偷盗、